

#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

陈浪南 陈景煌\*

**内容提要** 本论文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就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某些经济变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影响。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 效应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一)一般性经验研究述评

Borensztein, Gregorio 和 Lee(1995)使用 69 个发展中国家 1970-1989 年的小组数据,检验经合组织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发现是:(1)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为经济增长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国内投资;(2)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协同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赖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3)外商直接投资并未挤出国内投资,而是带动了国内投资。该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但并未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只能说为“技术溢出”提供了间接证据。Arrken 和 Harrison(1999)为研究 FDI 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采集委内瑞拉 4000 多家制造商 1976-1989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外资比率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同行业中外资企业所占比率越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就越低。外资一般投资于效率高的行业且与较高生产率的内资企业合资经营,在合资企业中可见“技术溢出”效应,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

业有技术溢出效应。

### (二)有关中国学者经验研究述评

王新(1999)根据哈罗德-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导致额外储蓄增加,且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几个跳跃式增长台阶。该文开拓了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经验研究思路,但认为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假设显然与中国的事实不符。于克萍、傅晓涛(1999)应用简单线性生产函数和 Koyck 几何滞后模型,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基础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理想吸收规模。通过建立国民经济总体的生产函数,反映经济增长和 FDI 之间的关系。在函数中把国民经济分为内资部门和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由于以对外借款方式流入的外资使用权归中国,这部分外资视为国内投资。计算结果显示:(1)外资部门的生产效率比内资部门高;(2)

\* 陈浪南:厦门大学财金系;陈景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厦门大学 1858 信箱 361005。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79870039、79800010)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9BJL034》的成果之一。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和中山大学王美今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给定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时间的推移, FDI 最佳规模相应增加。该文应用的线性生产函数与内含投入要素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假设, 这与现实生产过程差距较大。钟昌标(2000)以综合诸生产要素函数为理论基础, 考虑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结构转换对总产出的影响, 选用 30 个省份 1988-1998 年的数据,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 GDP 的贡献。结果表明: (1) 外商直接投资与 GDP 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2) 外资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转弱; (3) 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该文回归分析得出的参数估计量负数较多, 其经济意义难以解释, 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强, 且各参数的估计量大部分未通过 T 统计检验, 可见其回归方程的多重共线性严重, 因而解释回归参数估计量的含义没有实际意义。

本文从总供给角度, 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索洛模型)和方法, 在劳动投入考虑人力资本作用的框架下测算固定资产投资, 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

### (一) 模型与假设

模型基本框架是一个改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建立增长模型, 假定经济满足如下条件:

假设一, 经济中只生产单一商品, 单一商品生产出来后, 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 假设二, 储蓄外生增加; 假设三, 劳动人数以外生比率增加; 假设四, 经济中不存在折旧, 投资等于资本存量的增加值, 这一假设对于索洛模型并不是必须的, 但不存在折旧的假设将会简化分析。

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基础是一个总增加值生产函数:  $Y = F(A, K, LH)$ , 它将增加值(Y)表示为最初投入的一个函数, 如有形资本(K)、劳动投入(LH), 以及观测不到的因素(A)。微分这一生产函数得出与产出增长率( $G_Y$ )、投入增长率( $G_K$  和  $G_{LH}$ ) 及观测不到因素的增长率( $G_A$ ) 相联系的表达式。因此, 有以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方程:

$$G_{GDP} = B_0 G_A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1)$$

其中,  $G_{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比,  $G_A$  表示观测不到的因素的增长百分比, 可以理解生产率增长百分比,  $G_K$  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增长百分比,  $G_{LH}$  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百分比。参数  $B_0$ 、 $B_1$ 、 $B_2$  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 衡量投入增长百分比导致的产出增长百分比。它们概括了一个国家可利用的生产技术资源。

第一项构成未被说明的增长残差项, 是由观测不到因素 A 的增长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部分。这一残差项从狭义上可以解释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从广义上是被忽略变量的计量值, 因测量起来十分复杂, 一般将其看成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但它事实上包含诸如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确切反映投入要素的作用, 本文用解释变量占被解释变量总变差的比例, 即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来调整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这样, 由式(1)估计出其他两个产出弹性后, 可用下面的式子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源。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W_K = R^2(B_1 G_K)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源于劳动投入的比重为:

$$W_{LH} = R^2(B_2 G_{LH})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为:

$$W_{FDI} = R_{FK} \times R^2(B_1 G_K)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4)$$

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M_K = G_{GDP} \times W_K = G_{GDP} \times R^2(B_1 G_K)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5)$$

劳动投入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M_{LH} = G_{GDP} \times W_{LH} = G_{GDP} \times R^2(B_2 G_{LH})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6)$$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M_{FDI} = G_{GDP} \times W_{FDI} = R_{FK} \times G_{GDP} \times R^2(B_1 G_K) / (B_1 G_K + B_2 G_{LH}) \quad (7)$$

其中,  $R_{FK}$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贡献。

(二) 样本的选取

为了获得足够的样本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本文的样本目标时间范围是 1981- 1999 年。由于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不足, 只好从各种渠道选择数据作为样本, 造成统计口径不一致的状况, 因而需进行相应的数据调整。

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本文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总资本投资的替代变量, 模型中变量  $G_K$  被用来测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的增长百分比, 为当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与上年固定资产存量的百分比。要准确估计中国的固定资产存量相当困难,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1950 - 1981 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作为截至 1981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存量。1982 - 1998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 》。1996 年以后, 统计起点由 5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人民币, 对起点以下的数据均未计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

2. 外商直接投资(FDI)。1981- 1983 年数据转引自王新( 1999)。该数据是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国际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估算的; 1984- 1998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 》。模型变量  $G_{FDI}$  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上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的百分比。

3. 全国从业人员(L)。1981- 1998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 》。模型变量  $G_L$  为当年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比。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对 1990 年以后的统计资料根

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进行了调整, 故本文对该年增长率除以 10 以修匀样本。

4. 从业人员人均人力资本(H)。1995 年以前的数据转引自沈利生( 1999), 1996- 1998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第一, 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 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本文着重研究教育这种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不涉及其他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知识和技能是通过教育及培训取得的, 而教育和培训的实施都要进行投资。劳动者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 可以把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余生收入的影响作为教育产出的度量, 也可以把教育的产出看做劳动者积累的人力资本。一般学历的提高将影响受教育人员的余生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学历、贡献、收入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教育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有多种形式, 本文采用刘遵义( 1995) 的方法, 用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表示人均人力资本, 即在小学、中学、大学接受教育一年就算其人力资本增加一个单位。在我们研究的时段里, 小学取 5 年。中学水平有初中、中等技术学校、高中等, 考虑到数据来源不同, 1995 年以前都取 9 年, 而 1996 年以后初中取 9 年, 高中取 12 年, 以修匀样本。大学水平的劳动力包括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 硕士、博士, 但数量较少), 这里都为 16 年。该人力资本测量方法是一种近似方法, 但它可以反映一般或总的趋势。受不同教育年限劳动力的比重、人均受教育水平如附表 1 所示。模型中变量 LH 指拥有人力资本的全社会从业人员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变量	系数估计值	t 值	F 值	可决系数
I	常数项	5. 958	3. 763	8. 813* *	$R^2= 0. 37$
	$G_{FDI}$	0. 09827	2. 969* *		$R^2= 0. 328$
II	常数项	- 1. 76	- 0. 579	9. 784* **	$R^2= 0. 583$
	$G_K$	0. 447	3. 303* **		$R^2= 0. 523$
	$G_{LH}$	0. 781	4. 015* **		
III	常数项	0. 503	0. 396	17. 694* **	$R^2= 0. 541$
	$G_{KLH}$	0. 362	4. 206* **		$R^2= 0. 511$

说明: \* \* 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 \* \* 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的劳动投入, 由人均人力资本与全社会从业人员数的乘积构成,  $LH = L \times H$ ; 其中  $L$  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进行了调整。变量  $G_H$  为当年人均人力资本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比; 变量  $G_{LH}$  被用来测量拥有人力资本的全社会从业人员劳动投入的增长百分比, 为当年全社会劳动投入比上年增长的百分比。

5.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_{GDP}$ )。以上年为基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比,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

6. 人民币汇率(ER)。为官方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

7. 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 $R_{FK}$ )。外商把 70% 左右的投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因此, 计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贡献率时, 按该比例推算(王洛林, 1997)。1981- 1998 年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基本情况见附表 1、附表 2 和附表 3。

(三) 定量分析结果

将经过处理的各个变量数据转入 SPSS 软件包中进行回归分析。将估算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代入(2)、(3)、(4)、(5)、(6)、(7)式中, 估算出国内生产总值的来源, 从而估算出各生产要素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分析步骤如下:

1. 以  $G_{GDP}$  为被解释变量, 以  $G_{FDI}$  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1 的模型 I。从中可以看到,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2. 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_{GDP}$  为被解释变量, 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G_K$ 、劳动投入增长率  $G_{LH}$  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1 模型 II。

模型 II 中,  $B_1 + B_2$  显示规模收益。增长模型中, 非常数的规模收益可能隐含观测不到的因素 A 的作用。为了正确测算投入要素对 GDP 增长的贡献, 首先利用 Wald 方法检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

$H_0: B_1 + B_2 = 1$

$H_1: B_1 = B_2 = 1$

表 2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来源

	全社会固定 资产(%)	外商直接 投资(%)	劳动(%)
1982	25.20	0.15	28.90
1983	22.27	0.14	31.83
1984	22.70	0.30	31.40
1985	27.60	0.40	26.50
1986	33.85	0.53	20.25
1987	34.91	0.56	19.19
1988	36.45	0.64	17.65
1989	45.31	1.15	8.79
1990	44.57	1.26	9.53
1991	39.98	1.19	14.12
1992	44.09	2.42	10.01
1993	45.37	3.88	8.73
1994	43.51	5.10	10.59
1995	42.28	4.61	11.82
1996	41.47	4.39	12.63
1997	40.01	4.21	14.09
1998	49.87	4.63	4.23

表 3 各生产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全社会固定 资产(%)	外商直接 投资(%)	劳动 (%)	其他 (%)
1982	2.29	0.01	2.63	3.79
1983	2.43	0.01	3.47	4.55
1984	3.45	0.05	4.77	6.34
1985	3.73	0.05	4.77	5.63
1986	2.98	0.05	2.98	3.67
1987	4.05	0.05	4.05	4.84
1988	4.12	0.07	4.12	4.71
1989	1.86	0.05	1.86	1.71
1990	1.69	0.05	1.69	1.58
1991	3.68	0.11	3.68	3.84
1992	6.26	0.34	1.42	5.92
1993	6.12	0.52	1.18	5.63
1994	5.48	0.64	1.33	5.25
1995	4.44	0.48	1.24	4.38
1996	3.98	0.42	1.21	4.00
1997	3.52	0.37	1.24	3.67
1998	3.89	0.36	0.33	3.25

在  $H_0$  成立的条件下, 对模型 II 进行变换, 有  $G^* = GDP - G_{LH}$  和  $G_{KLH} = G_K - G_{LH}$ , 将  $G^*$  对  $G_{KLH}$  回归, 从而得出模型 III 的估计结果。由模型 II 和 III 的残差平方和  $e_{e(II)}$  和  $e_{e(III)}$ , 可以计算 Wald 检验统计量:

$$F = \frac{(e_{e(III)} - e_{e(II)})/1}{e_{e(II)}/(17-3)} = \frac{(71.099 - 67.829)}{67.829/14} = 0.6749$$

由于  $F_{0.05}(1, 14) = 4.60$ , 因此, 可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

3. 根据模型 III 回归得到参数  $B_1$  估计量(为 0.362)及参数  $B_2$  的估计量(为 0.638), 将  $B_1$ 、 $B_2$  的估计量和判决系数  $R^2$  (0.541) 分别代入公式 (2)、(3)、(4)、(5)、(6)、(7), 可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源的估计量(见表 2)和各生产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贡献的估计量(见表 3)。

### 三、结论与本研究的局限性

1. 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相关; 而人力资本和劳动存量的增长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显著线性相关。这表明, 一般的劳动力数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构成限制性因素, 只有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力才是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因此, 只有增加教育投资, 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 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

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显著线性相关, 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1982-1998 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 40% 左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逐年增加。1982-1991 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小, 低于 1%, 年贡献低于 0.1%。也就是说, 1982-1991 年, 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低于 0.1%。在 1992 年以后,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

著增加, 年贡献在 0.4-0.6%。也就是说, 1992-1998 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中约有 0.5 个百分点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

3. 回归残差较大。分析表明, 45.9% 的增长是由最初投入增长之外的因素带来的。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随着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农业、国有企业)转移到边际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工业、服务业、非国有工业), 经济转型进程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也可能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然而,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变时期, 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假设应该是合理的。

由于资料不完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的计量相当困难, 影响了本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对国内生产总值、生产要素投入均未作相应的价格调整, 事实上, 各种价格是变动的且不太可能协调一致; 本研究对截至 1981 年底的资本存量估计也可能有偏差, 而且, 为了简化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 人力资本以人均受教育年代替的估计也只能是近似; 本研究暗含假设资产与劳动的利用率保持不变, 而未作相应调整。这些变量的实际增长可能被高估或低估了, 这些数据对增长残差项的净影响不太明确, 特别是回归方程式中的解释变量与残差项有关, 从而使产出弹性的估计有偏差。而且, 外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技术含量较高, 管理水平一般来说也较高, 因而其产出应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平均水平, 再加上 1994 年以前中国外汇汇率被高估, 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贡献被低估。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可能被低估。判决系数是表明 1982-1998 年区间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 本文在估算各生产要素于各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时, 暗含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每年均保持一致, 这可能与事实不符, 从而影响估算数值的准确性。

附表 1 受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及人均受教育水平

	文盲 (%)	小学 (%)	中学(%)		大专以上 (%)	人均受教育 水平(年)
			初中	高中		
1981	46.40	14.86		37.44	1.3	4.7
1982	44.61	14.63		39.45	1.31	4.89
1983	41.57	13.96		42.73	1.74	5.25
1984	38.69	12.89		46.21	2.21	5.62
1985	35.85	12.51		49.07	2.57	5.94
1986	33.36	13.44		50.91	2.29	6.13
1987	31.13	14.27		52.55	2.05	6.3
1988	29.04	15.87		52.56	2.53	6.45
1989	27.23	19.92		50.13	2.72	6.44
1990	25.25	23.29		48.42	3.04	6.49
1991	23.34	25.55		47.68	3.43	6.59
1992	21.92	27.25		47.17	3.66	6.67
1993	20.71	27.98		47.27	4.04	6.77
1994	19.54	27.69		48.32	4.45	6.93
1995	18.36	26.83		49.85	4.96	7.12
1996	12.9	35.5	37.5	11.3	2.8	7.3
1997	11.7	34.8	37.9	12.1	3.5	7.51
1998	11.5	34.2	38.9	11.9	3.5	7.5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1998、1999 年; 1995 年以前的数据引自沈利生(1999):《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第 8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附表 2 1981- 1998 年各样本基本情况汇总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人民币)	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人民币)	全社会从业 人员数(万人)	美元平均汇率 (元/美元)	人均人力 资本(年)	全社会从业人员 劳动投入(人年)
1981	4 862.4	6.26*	10 293.2*	43 725	1.71	4.7	205 507.5
1982	5 294.7	5.4	1 230.4	45 295	1.89	4.89	221 492.55
1983	5 934.5	6.36	1 430.1	46 436	1.98	5.25	243 789
1984	7 171.0	12.58	1 832.9	48 197	2.33	5.62	270 867.14
1985	8 964.4	16.61	2 543.2	49 873	2.94	5.94	296 245.62
1986	10 202.2	18.74	3 120.6	51 282	3.45	6.13	314 358.66
1987	11 962.5	23.14	3 791.7	52 783	3.72	6.3	332 532.9
1988	14 928.3	31.94	4 753.8	54 334	3.72	6.45	350 454.3
1989	16 909.2	33.92	4 410.4	55 329	3.77	6.44	356 318.76
1990	18 547.9	34.84	4 517.0	63 909	4.78	6.49	414 769.41
1991	21 617.8	43.66	5 594.5	64 799	5.32	6.59	427 025.41
1992	26 638.1	110.07	8 080.1	65 554	5.51	6.67	437 245.18
1993	34 634.4	275.15	13 072.3	66 373	5.76	6.77	449 345.21
1994	46 759.4	337.67	17 042.1	67 199	8.62	6.93	465 689.07
1995	58 478.1	375.21	20 019.3	67 947	8.35	7.12	483 782.64
1996	67 884.6	417.21	22 913.5	68 850	8.31	7.3	502 605
1997	74 462.6	452.57	24 941.1	69 600	8.29	7.51	522 696
1998	79 395.7	454.63	28 406.2	69 957	8.28	7.54	527 475.78

说明: \* 为历年的累计金额。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 整理。

附表 3

1982- 1998 年各变量测算结果

%

	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外商直接 投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	全社会劳动 人员增长	劳动投入增长	人均人力 资本增长
1982	9. 1	11. 95	83. 33	n. a.	3. 59	7. 78	4. 04
1983	10. 9	12. 41	54. 55	0. 6	2. 52	10. 07	7. 36
1984	15. 2	14. 15	69. 81	0. 6	3. 79	11. 11	7. 05
1985	13. 5	17. 20	54. 28	1. 1	3. 48	9. 37	5. 69
1986	8. 8	18. 01	39. 70	1. 3	2. 83	6. 11	3. 20
1987	11. 6	18. 54	35. 09	1. 5	2. 93	5. 78	2. 77
1988	11. 3	19. 61	35. 85	1. 6	2. 94	5. 39	2. 38
1989	4. 1	15. 21	28. 03	1. 8	1. 83	1. 67	- 0. 16
1990	3. 8	13. 52	22. 50	2. 0	1. 55	1. 64	0. 78
1991	9. 2	14. 75	23. 00	2. 6	1. 39	2. 95	1. 54
1992	14. 2	18. 57	47. 14	2. 9	1. 17	2. 39	1. 21
1993	13. 5	25. 33	80. 09	5. 3	1. 25	2. 77	1. 50
1994	12. 6	26. 35	54. 58	12. 0	1. 24	3. 64	2. 36
1995	10. 5	24. 50	39. 23	11. 1	1. 11	3. 89	2. 74
1996	9. 6	22. 52	31. 34	10. 6	1. 33	3. 89	2. 53
1997	8. 8	20. 01	25. 88	10. 6	1. 09	4. 00	2. 88
1998	7. 8	18. 99	20. 65	9. 3	0. 51	0. 91	0. 40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1999) 整理。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1999):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沈利生(1999):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洛林主编(1997):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王新(1999):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 3 期。

于克萍、傅晓涛(1999):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研究》,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学报》7月第 19 卷增刊。

钟昌标(2000): 《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 期。

刘遵义(1995):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5, Vol. 1, No. 3.

Arrken, Brian J. and Ann F. Harrison(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9, Vol. 89 No. 3.

Borensztein, Eduardo and Jose De Gregorio, Jong-Wha Lee (1995):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s 505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95.

Jorgenson, Dale W. Kevin J. Stiroh (1999):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9, Vol. 89.

Zebregs, Harm(1998): “Can the Neoclassical Model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Developing Countries? ”, IMF Working Paper s WP/98/13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8.

( 截稿: 2002 年 1 月 责任编辑: 李元玉)